

# “宋韵文化”的构成与核心

□ 沈松勤

**内容提要**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规范下,通过内省营造了继先秦以来的又一座“文化高峰”。这座高峰的顶端就是以经世为终极目的的理学。理学是宋代文化的核心,也是宋代社会的大脑,具有“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的意蕴和韵味,体现出不同于汉、唐的精神境界,作用于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使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透过宋代文化理解其中的意与韵,探讨宋人的精神塑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宋韵 致广大 尽精微 极高明

作者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311121)

DOI:10.14167/j.zjss.2023.01.008

所谓“宋韵文化”,就是宋代文化的意蕴和韵味,是宋代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人们的认知中,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甚至有“弱宋”之称。然而,宋代的文化异常繁荣,宋人以其独特的智慧与强大的创造力,营造了继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关于这一点,先哲前贤早有评说。王国维曾说:“天水一朝(按:指宋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sup>①</sup>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sup>②</sup>邓广铭也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sup>③</sup>无论这些评说是否杂有情感色彩,宋代文化是华夏文化中的一座高峰,却是不争之事实。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宋代文艺复兴说”后,又认为宋代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评价更高。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在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基础上,总结宋代

有别于以往朝代的四大领域的表现:在政治制度上,贵族势力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集权下庶民实力的上升;在经济活动上,货币经济取代了实物交换;在学术思想上,从汉唐的注疏训诂之学进入了自由思考的时代;在日常生活上,逐渐摆脱了中世旧习的生活样式,形成了独创的、平民化的新风气,广为人们所认同。这四大领域的相互作用,为宋人营造“文化高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犹如埃及的金字塔,宋代这座“文化高峰”是由从底部到顶端不同层级组成的。作为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主张为人要“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sup>④</sup>,因为具备了这一知识结构的人,也就有了高品位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同时为文化创造注入了丰厚的养料和强劲的动力,也更有利于事功活动的展开。而经、史、文就是宋代这座“文化高峰”的最高层,“经”是高峰中的最顶端。所谓“经”,就是宋代儒学复兴后形成的理学。宋代理学的内容虽十分多元,却均以经世为终极目的,属于经世之学,也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哲学。就其形而上内涵而言,宋代理学集中体现为一种精神和信仰,是宋代社会的大脑与灵魂。

如果说,人们在制度规范下进行的各种实践

活动的历史如同一个人的骨架,包括诗词、绘画、建筑、陶瓷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如同一个人的血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具有核心地位。如果一个社会的哲学贫乏,丧失了精神和信仰,人也就成了生物意义上的人,文化就会随之坍塌,社会就会变得可怕。在宋代,哲学空前发达,直接传递着宋人的“中枢兴奋”,有效地促进了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使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聚集成了一座“文化高峰”。

那么,宋代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儒家经典之一《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庸》受到了宋人的高度重视与推崇。有宋一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朱熹则直接将该篇抽离出来,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作为全民的教科书。《中庸》中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两句。这两句虽指人的修养,却可视为宋代文化的核心所在,也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化的意与韵,以及宋人的精神境界。

## 二

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中外不少学者作过深入探讨。美国汉学家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中,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中国台湾学者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从“中国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排他的特点,与刘子健的“内向说”有相同之处。他们的说法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纷纷响应,其中不乏认同。

认为宋代文化“内省”或“内敛”,不乏事实依据。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经常遭西夏的

侵扰;南渡后,更是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找立身之本。邵雍《自余吟》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主张王者应该与百姓同乐同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范仲淹则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境界更高,意蕴更深。诚如南宋王十朋《读岳阳楼记》所说:“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范仲淹的“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乃至久远,至今不乏现实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人们熟知的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其气度和眼光,为唐人所无。再如自古以来人们面对自然永恒而人生短暂这个哲学命题,有不同的认知与态度。曹操主张在苦短的人生中积极有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李白因人生短暂,主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强调在苦短的人生中,要及时行乐;苏轼却认为“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人与天地同在,永恒不变,其广博大气为前人所无。

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到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sup>⑤</sup>所谓“国初人”,就是指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等人;“二帝三代”指尧、舜二帝与夏、商、周三代,是古人的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效法三代”或“欲复二帝三代”,从而超越汉、唐,是宋人普遍的治世理想。理想之高远,气局之广大,更是汉、唐难以企及的。

朱熹所说的“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

代”,就是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等人强调的“道”或“理”,是学术与政治相互驱动、相互交融的产物,集中体现了宋代理学的经世内涵。具体地说,“北宋儒学复兴之初,古文运动倡导者已根据他们理想中的上古三代,发出重建秩序的呼声。这一呼声的原动力则是长期混乱下民间期待文治秩序的迫切心理,初期儒学的关怀大体偏重在政治秩序方面,对于‘道德性命’之说则涉及未深;易言之,‘外王’为当务之亟,‘内圣’可且从缓。但至迟在改革运动的高潮时期,‘内圣’与‘外王’必须兼备的意识已出现了,王安石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以‘道德性命’之说打动神宗,这是他的‘内圣’之学;他以《周官新义》为建立新秩序的根据,这是他的‘外王’理想。道学的创始人张载、二程与王安石属于同一时期,就响应古文运动领袖重建秩序的号召而言,他们与王安石无异。但王氏的‘内圣外王’系统的完成与流传毕竟抢先了一步,这便成为道学家观摩与批评的对象。所以从儒学的整体发展来说,‘新学’超越了古文运动,而道学也超越了‘新学’,确是一层转进一层。”也就是说,从古文运动到“荆公新学”,再到程系道学的发展与成熟,犹如一个人不断成长的生命历程,是宋代儒学复兴后理学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在基本性质和最终目的上均明显具有一致性,都是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也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内圣外王”,实现“欲复二帝三代”的理想,只是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张与内涵,不同的阶段都具有相应的超越性,即所谓“一层转进一层”。到了南宋,以“内圣”与“外王”为支架的理学,更趋深入与完善。

与唐人的粗狂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致广大”,而且精细入微,其文化活动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现有哲学思想史研究成果表明,在唐代,儒、道、释三家并存,各行其道,而作为以经世为目的的宋代理学,则融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出现了不同的学派,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学统四起”;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且如红、橙、

黄、绿、青、蓝、紫七色阳光归于一白,在“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 三

程颐说:“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还认为“欲趋道”,必须首先注意个体的心性修养:“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矣。”学者诚意、正心、养性,即可成就圣人人格,进而可复“二帝三代”。

需要说明的是,儒学的复兴并非始于北宋。陈寅恪考察韩愈的道统思想时指出:“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不过韩愈倡导的儒学虽为宋代新儒学奠定了基础,但在内涵上与宋代儒学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其道统思想也没有得到中晚唐士人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中晚唐,类似李商隐“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之声,时有所闻。其原因之一,在于践行儒学所必需具备的主体基石尚未真正确立。儒学之所以能在仁宗年间开始全面复兴,则与实践主体自觉恪守“为己之学”息息相关。

周行己说:“何谓为己之学?以吾有孝悌也则学,以吾有忠信也则学。学乎内者也,养其德者也。故为己而学者,必有为人之仕矣。何谓为人之学,人以我为多闻也则学,人以我为多能也则学,学乎外者也,利其闻者也。故为人而学者,必有为己之仕矣。”<sup>①</sup>朱熹亦云:“盖为学而求名者,自非为己之学。”<sup>②</sup>陈文蔚也指出:“笃志力行,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不与世俗浮沉于富贵贫贱、得丧祸福之中……以洗其凡俗之陋。”<sup>③</sup>诸如此类的表述,屡屡见诸宋代载籍,昭示了宋代士人对“为己之学”的普遍重视。

作为士人的立身之道,“为己之学”是儒学强调个体心性修养的重要思想。《论语·宪问》载孔子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正义》解释为“此章言古今学者不同也。古人之学,则履而行之,是为己也。今人之学,空能为人言说之,己不能行,是为人也。范晔云:‘为人者冯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sup>④</sup>指出了“为己之学”与“为人

之学”的不同秉性与品格；而儒家肯定与张扬“为己之学”的思想，昭然若揭。在唐代，尽管不乏自觉履行孝悌忠信之人，在具体的立身处世中，却很少像宋人那样重视“为己之学”。尽管韩愈立志恢复长期失坠的儒家学说，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sup>⑮</sup>，但由于他建立儒家道统的主要目的在于陈寅恪所说的“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sup>⑯</sup>，所以无意强调关乎自我修养的“为己之学”。在欧阳修看来，韩愈“当论时事，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无异庸人”<sup>⑰</sup>，遑论“为己之学”！随着仁宗年间儒学的复兴、理学的建构，强调“为己之学”成了宋代士人社会的一种思潮。无论“因心以会道”，心怀忠信孝悌，履而行之，抑或心不为富贵贫贱所萦、穷通祸福所累，“洗其凡俗之陋”，“为己之学”的任务在于修炼主体心性，使之进入“内圣”之境。宋人“内圣”的目的在于“为人之仕”即“外王”。也就是说，“为己之学”是宋代士人建构“内圣外王之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基石。

宋人通过“为己之学”的心性修养，既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又树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立身之道。基于这一立身之道，他们对唐人的患得患失、欢戚无常，往往持有批评态度。上述欧阳修批评韩愈就是一例。又如蔡居厚在评柳宗元诗歌时说：“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阅己伤志，故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达理也。”<sup>⑱</sup>朱熹评杜甫《同谷歌》亦云：“杜陵此章，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sup>⑲</sup>他认为柳宗元“未达理”，杜甫“不闻道”，与欧阳修视韩愈为“庸人”同出一辙，也就是苏辙所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芥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卒，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sup>⑳</sup>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修养，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宋代士大夫虽具有参政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主体结构，其政

治地位比唐人高，但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际却比唐人多得多。在遭际政治上的坎坷时，宋人普遍体现出与唐人迥然有别的心境。如范仲淹“以言事凡三黜”，被人誉为“三光”，“士论壮之”<sup>㉑</sup>，昭示了士人群体对待穷通荣辱、得丧祸福的一种态度与秉持。这种秉持就是石介所说“达也，以孔子之道也；穷也，以孔子之道”，“穷达之间”，皆“卓然有余裕”<sup>㉒</sup>。景祐年间，欧阳修因言事迁谪夷陵，至贬所，致书尹洙云：“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他还勉励被贬的同党“甚勿作戚戚之文”<sup>㉓</sup>。与欧阳修同时“待罪去朝”的曾必疑，在贬所作之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原因就是他“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sup>㉔</sup>，在面对得丧祸福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中，践行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为己之学”，具体呈现了“内圣”心境。

事实充分表明，宋人更看重自身的修养。在修养中，“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范仲淹、欧阳修、曾必疑对待被贬的态度就体现了这一点。又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王安石与苏轼在熙宁至元丰的近18年围绕“国是”的争斗中，互不相让，但在元丰八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两人促膝谈心，其乐融融。而在建中靖国元年，经过九死一生的苏轼写了一首六言诗《自题金山画像》，其中有两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进入了无垠而光明透彻的自由王国。“道中庸”就是以天下为大本，以天下为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只有达到道的本体“中”的状态，才能用“和”，既以“和”为贵，又“和”而不同，这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像王安石与苏轼那样和而不同，更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统四起”，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当然，通过修养而“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的意与韵或精神境界的形成，离不开“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祖宗家法”的一个核心就是朱熹所说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sup>㉕</sup>宋代实施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在科举制度上，据专家考证，唐代每次取士不超过30人，而仅就北宋而

言,开科69次,共取士35612人。如果包括特奏等,取士总数则达61000人,平均每年约为360人(南宋更多)。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唐代的科举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进行了诸多打压,但唐代门阀世族仍然保持着绝对的政治势力。就宰相而言,仅世族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宰相,占全部唐代宰相369人的十五分之一。在宋代宰辅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比重,布衣平民出生者竟达53.3%。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名相,均出于平民或低级品官之家,但他们后来成为了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人物。宋代全面践行了“士大夫治天下”的“祖宗家法”。读书人以国家社会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强化了他们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十分丰富,表现领域也相当广泛,其核心却在于哲学,或者说,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独到的哲学。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在内省中,形成了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在这个哲学体系中,宋人的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拥有坚定的信仰与“极高明”的精神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透过宋代文化的研究、文化传播去理解宋人在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境界,深入探讨人的精神塑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注释:

①王国维:《宋代金石之学》,载《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书店1983年,第70页。

②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③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④叶适:《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文集序》,载《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61年,第225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5页。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1年,第

36-64页。

全祖望:《宋元儒学案序录》,载黄宗羲《宋元学案》卷首,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第577页。

⑩陈寅恪:《论韩愈》,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2、319-332页。

李商隐:《上崔华州书》,载《樊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⑪周行己:《从弟成已审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说》,载《浮沚集》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9页。

⑫朱熹:《养生主说》,载《晦庵集》卷六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7页。

⑬陈文蔚:《答徐子融师尧说》,载《克斋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9页。

⑭何晏注、邢昺疏:《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196页。

⑮详见韩愈《与孟简尚书书》,载《韩愈文集》,刘真伦等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88页。

⑯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载《欧阳修全集》卷七一,中华书局2001年,第491页。

⑰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蔡宽夫诗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3页。

⑱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页。按杜甫《同谷歌》卒章云:“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⑲苏辙:《栾城三集》卷八,载《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29页。

⑳文莹:《湘山野录·续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7-78页。

㉑石介:《送张绩李常序》,载《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6页。

㉒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载《欧阳修全集》卷六九,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98页。

㉓余靖:《曾太傅临川十二诗序》,载《武溪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26页。

㉔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第3073页。

责任编辑 刘洋

## ABSTRACTS

---

point, the issue of value goals and the issue of justice. These core problems derive more specific problems in different theoretical contexts and practical situations, forming a systematic problem domain. Clarifying the theory context of this problem domain will provide a dialogue framework for different AI governance agent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inciplism; governance; ethics

### **Moralizing Technology and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9)

Wang Xiao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the ethical challenges posed by disruptive technolog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 Dutch school's theory of moralizing technology may provide some insights into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alizing technology is not about using technology as a neutral tool to achieve moral purposes. The core of moralizing technology is a "relational ontology" that assumes that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are mutually constitutive in perception, and that technological artifact always mediates our moral agency. This line of thought emphasizes the value sensitivity of designing technology, requiring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to conduct a "mediational analysis" that considers not only the practical function of technology but also the unconventional uses of technology and anticipates risks posed by these novel uses. Further,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of technology, "mediation analysis" requires scientists to be highly conscious of the value sensitivity of the technology, to try to avoid possible value conflicts, and to guard against possible value colonialism.

**Key words:** moralizing technology; ethics of technology; Dutch school

### **The Constitution and Core of Song Yun Culture** (125)

Shen Songqin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The Song people, who were born and bred in distress, created another "cultural peak" after the pre-Qin Dynasty through introspection under the "ancestral family law". At the top of this peak is Neo-Confucianism, whose ultimate purpose is to study the world. Neo-Confucianism is the core of Song Dynasty culture and the brain of Song society. It has the connotation and flavor of "to the broad", "to be refined" and "to be brilliant". It reflects the spiritual realm different from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works on various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the Song people, making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reach a new height. There i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lingering charm through Song culture and explore the spiritual shaping of Song people.

**Key words:** Song Yun Culture; to the broad; to be refined; to be brilliant

### **The Tradi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and Its Theoretical Problems** (130)

He Xinyu, Wang Jie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aesthetics, various naming methods such as Western Marxism, new Marxism and Post Marxism, as well as various theoretical disputes within Marxist aesthetics, are essentially derived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theoretical problem of 'what is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of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history, the tradition of